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李玉明

力高才 著

明代大同，作为一个极为突出的军旅文化典型，正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极富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色彩的文化遗产，是晋商兴起的重要契机。

明代大同军旅文化

目 录

引子	(1)
一、九边之首	(1)
二、军事斗争	(4)
三、城市防御	(14)
四、培育晋商	(20)
五、军旅诗坛	(28)

引子

传统文化是一个使用极其广泛的概念,其内容当为历代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和文化意识。例如说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古典诗文、忠孝观念之类。传统文化带有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各传统文化在其发生时,都系应运而生,因而有其积极作用。但到人世沧桑后,它们或者与时俱进,演化出新的内容和形式;或者固化为明日黄花,并在时间之流的冲刷下飘零凋残;或者迁移别处,重振雄风,异地嫁接;或者昙花一现,未老先衰,朝菌不知晦朔。然而不论其内容深浅、时间久暂、空间大小、作用强弱,它们都曾是合理的,分别只在于理之正邪、事之顺逆。明代大同,作为一个极为突出的军旅文化典型,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富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色彩的文化遗产。本文拟就大同军旅文化的几个重要侧面进行剖析和描述。

一、九边之首

有明一代,大同为九边重镇,地当明王朝北疆国防前线冲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何谓九边?乃明王朝设立于北边的九个防务重镇,即辽东镇(又称辽东边,下同)、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又称山西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合称为九边。其设置是从对北方来犯之敌的

战略防御和建都北京通盘考虑的。九边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大体沿长城一线，自东诱逸而西，绵延万里余。九边之间，指臂相依，形成一个城堡相连、烽堠相望的战略防御带。而大同，在九边之中尤为重要，堪称重中之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大同府“据天下之脊，自昔用武地也”。又说：“女真之亡辽，蒙古之亡金，皆先下大同，燕京不能复固矣。故明都燕，以郡为肩背之地，镇守攸重。正统末，恃以摧狡寇之锋。天顺中石亨镇此，尝言大同士马甲天下。若专制大同，北塞紫荆，东据临清（山海关故址），决高邮之堤（运河大堤），以绝饷道，京师可不战而困。”这些看法当然是很正确的。明王朝对大同府的高度重视，从下列史实可以看出来。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1424），蒙古鞑靼部阿鲁台进犯大同，明成祖亲统大军，出塞追击，阿鲁台远遁，成祖撤军还至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不幸病逝。这是明成祖为巩固边防第五次御驾亲征了，时年65岁，为国事劬劳而死，可见成祖对大同的重视。正统十四年（1449），统领蒙古鞑靼瓦剌两大部的太师也先，兵分四路进攻明朝，也先亲率主力进袭大同。边报紧急，明英宗决定御驾亲征，惜乎用人不淑，返京途中于土木堡被俘，这也可以看出明王朝对大同的重视。明代宗更直截了当地说：“大同，吾藩篱也”，这是他从土木堡之役和京师保卫战中观察分析敌我情势得出的认识。总之，不应将九边平列看待，实际上蒙古各部入犯明之北疆，蓟镇、宣府、大同实当冲要，而辽东、陕甘不过是侧翼而已。故《三云筹俎考》说：“我朝设大同府，建代藩，永乐七年置镇守总兵官，于是大同称镇。是镇也，北

捍胡虏以控带幽燕，南总三关以招徕晋魏，翼卫陵寝，屏蔽神京，屹然甲九塞焉……”九塞即九边，甲九塞就是九边之首的意思。看来称大同为九边之首并非过誉，而是实事求是的论断。根据清黄本骥编《历代职官表》，明代九边之中，总兵挂印称将军者，大同总兵称征西前将军，辽东总兵称征虜前将军，宣府总兵称镇朔将军，甘肃总兵称平羌将军，宁夏总兵称征西将军，其余四镇总兵均不得称将军挂印。当然总兵官并不只设于九边，根据《明史·职官志》，明代共在 21 处设立镇守总兵官。明代在各地设置卫所，略如府兵制，其常设统率机关为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都司掌一方军政，各率其卫所以隶于五军都督府而听命于兵部。这就是说，明代军政、军令是分设的，它们分别采自两个不同的军事机构。都指挥使司为地区军事总机构，长官有都指挥使、都指挥同知、都指挥佥事。都指挥使司与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掌军政、民政、刑狱，为省级国家机关，长官即都指挥使、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为省级最高官员，实行都、布、按三司鼎立之制，但大事仍须会商。山西省这套衙门当然也设得很严密。但因大同是九边重镇，山西都指挥使司并不直接管理大同军政，而是在大同设山西行都指挥使司，长官为行都指挥使，简称大同都司。明代先后在全国设立了 16 个都司、5 个行都司，大同都司就是这 5 个行都司之一。“行”是代行的意思，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大同都司）代行山西都指挥使司在大同的职权。这也是很特殊的设置，足见大同军事地位的重要。又，明中叶以后，正统元年（1436）始设宣大巡抚，景泰二年（1451）宣府、大同分

设巡抚，后或分或合，成化十年（1474）后变为专设，并加赞理军务。景泰二年则以尚书总理军务，实即总督，但尚未成为专设，成化、弘治间有警则遣。正德八年（1513）正式设宣大总督，称为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宣大总督初驻宣府，后移驻怀来，最后迁至阳和。巡抚和总督之设，目的仍然是加强大同军务，亦显示了大同作为九边之首的重要性。明人马文升说：“我之所以捍御北虏者，惟大同宣府二镇，以为藩篱。”马文升曾任兵部尚书，他对大同的这种重要性，真是洞若观火。

二、军事斗争

历史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军旅文化的载体主要是军事地理形势和军事斗争。明代 200 多年中大同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军事斗争史，而这部军事斗争史又和明代北疆的军事斗争桴鼓相应，或者说是明代北疆军事斗争的缩影。

（一）洪武至永乐年间（1368~1425）

这一时期是明王朝筹建大同边防的时期。洪武二年（1369），明大将常遇春率军围攻大同，元大同守将竹贞不战而逃，明收复大同。但常遇春所率明军主力立即西征而去，大将军徐达派都督同知张兴祖将宣武、振武、昆山三卫士卒来守大同。此时元顺帝仍在近塞之地活动，收拾余烬和明王朝武装力量周旋，乃派其将脱列伯、孔兴以重兵来攻大

同,力图恢复,大同危急。洪武二年(1369)八月,平章李文忠在前往甘肃庆阳作战途中经太原,闻大同受敌,遂返辔出雁门、马邑,于白杨门北大败蒙古军,生擒脱列伯,俘虏万余人,孔兴走绥德,为其部将所杀。“元主知事不济,无复南向矣。”(《明太祖实录》)。洪武三年(1370)元顺帝死,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仍称大元皇帝,蒙古名毕里克图可汗,建元宣光,历史上称为北元。明军袭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南),俘元宗室及图籍、珍宝,爱猷识理达腊率数十骑逃往和林(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此时扩廓帖木尔在兰州被明军击败,亦逃到和林,和林成为北元汗国的政治中心,复派兵侵扰明之沿边各地。于是明廷乃大力加强大同守卫。洪武三年(1370)置蔚州卫、大同左卫、大同右卫、朔州卫等。洪武三年开始在大同实行开中法,鼓励商人输送粮米至边塞而给以食盐运销权。当时规定商人在大同仓入米1石、在太原仓入米1.3石则给予200斤的盐引。洪武四年(1371)置大同都卫,初治白羊城(今左云东北4公里古城子),第一任指挥使为耿忠。洪武八年(1375)改称山西行都指挥使司,仍治白羊城,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移治大同城。洪武四年七月命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自北平往山西操练士马修缮城池,“太原、蔚、朔、大同、东胜军马及新附鞑靼官军悉听节制”。洪武五年(1372)徐达开始修筑大同城,六年(1373)徐达即在大同、朔州、代州一带筹边,并在大同北猫儿庄与扩廓帖木尔部接战获胜。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朱元璋释放了爱猷识理达腊的儿子买的里八刺,厚赠遣送北归,附申和议,爱猷识理达腊有所感动,由此蒙古和明

朝之间保持了一段相对平静时期,但明王朝仍不敢放松大同边防。一方面大力发展大同商屯、军屯,广筹粮饷,作长期守御之计;另一方面慰劳守军赏赐降人。洪武十一年(1378)爱猷识理达腊死,其弟脱古思帖木尔继立为可汗,又加紧了对明北疆的侵扰掳掠。洪武十三年(1380)明大将沐英袭击了脱古思帖木尔的老巢和林,洪武二十一年(1388)大将蓝玉统大军十五万北征,直至脱古思帖木尔牙帐捕鱼儿海(贝尔湖),大破其军,脱古思帖木尔率数十骑遁走,同年为其部将也速迭儿所缢死,明之北疆才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安宁。洪武二十五年(1—392)改封豫王朱桂为代王,让其就藩封于大同,并于大同城中立五卫,城东立五卫,东胜立五卫,大同城西立七卫。脱古思帖木尔死后,蒙古分裂为三部,即辽河及迤北地域的兀良哈部,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的鞑靼部,科布多河及叶尼塞河流域的瓦刺部。其中鞑靼部最强,仍传蒙古汗位。三传至坤帖木尔,为部下鬼立赤所杀,始去元国号,改称鞑靼可汗。蒙古封建主从各自利益出发,开始分道扬镳。兀良哈部头领纳哈出,率部投降明朝,明设兀良哈三卫以处之。于是蒙古三部只剩两部,鞑靼居东,瓦刺居西,相互仇视,争夺蒙古宗主地位。燕王朱棣称帝后,于永乐元年(1403)派江阴侯吴高镇守山西大同,防御胡寇,节制山西行都司诸卫所,虽称镇守而不称总兵,但实际是总兵职责,明《大同府志》就把他列在总兵一栏。永乐十一年(1413)从吴高请,修筑了山西沿边烟墩(烽台)。永乐十二年(1414)召吴高还京,不久免去其职,任命朱荣任总兵官,大同有总兵官由此始。永乐二

十年(1422)大同府各卫都配备了神机铳炮,增强了战斗力。明成祖对鞑靼、瓦剌两部的策略是以夷制夷,即使之内讧不和,又不使其任何一部强大;而对蒙古的战略则是以攻为守,故成祖曾五次大规模出征,第一次亲征鞑靼部本雅失里、阿鲁台,第二次亲征瓦剌部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第三次至第五次皆亲征鞑靼部阿鲁台。其中第五次亲征发生于1424年,即是为解除鞑靼部阿鲁台对大同的围攻。成祖于返军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蒙古势力受到数次打击,损失惨重。成祖五次亲征漠北,虽未解除蒙古封建主对明朝的威胁,但有效制止了蒙古封建主的侵扰,使大同等九边边防安定,国内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二) 宣德至成化年间(1426~1487)

宣德年间,鞑靼部阿鲁台和瓦剌部脱欢跃杀不已,无暇寇略明边。而此时镇守大同的总兵武安侯郑亨亦为老成持重、善抚士卒之封疆大吏,治边有方,明廷为之佩征西将军印,以后大同总兵皆佩此印,成为惯例。宣德九年(1434)郑亨卒。同年鞑靼部封建主阿鲁台在察汗淖儿地方遭脱欢攻击,被杀,瓦剌部脱欢遂统领了鞑靼、瓦剌两大部,欲自称可汗,以众议未协,遂以鞑靼部原元朝皇族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太师(丞相)。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子也先继位为太师,自封淮王,脱脱不花仅有可汗名义,实际蒙古各部族完全统属于也先。此人野心极大,为满足掠夺欲望,不时引兵进窥蓟、辽、宣、大各边,破坏了维持多年的正常关

系。他还西征中亚，东攻兀良哈，打算在中原重建元王朝，严重地威胁明王朝。而此时的明英宗，庸碌无能，宠爱宦官，整个统治阶级日益腐朽，阶级矛盾尖锐，边境防务废弛，疏于戒备。也先借遣使至明贸易为名，搜集情报，购买武器，蓄谋发动大规模进攻。明廷原来规定，瓦刺遣使至北京，明王朝要赏赐使者，并规定使者不得超过三四十人。也先自恃强大，不遵约束，每年遣使骤至 3000 余人，且往来多行杀掠，又挟他部与俱，邀索中国贵重难得之物，单是大同一地，“往来接送及延住弥月，供牛羊三千余只，酒三千余坛，米麦一百余石，鸡鹅诸物，莫计其数”。而蒙人所进之马则瘦小不堪，毛皮成色甚劣，要求给值则照上等，稍不如意，就搅扰官府，打伤军民。明廷在帑藏耗竭、人民不满的情况下，对其所贡驼马，要求随水草放牧前来，沿途不支刍料，对其索求诸物，只给其 1/5。也先便以“减少了赏赐”为借口，于正统十四年(1449)秋，发动大规模战争。他调集了蒙古各部数十万大军分四路向明王朝北部沿边发起进攻，本人则亲率主力直驱大同。七月十一日也先向大同重要隘口猫儿庄进击，大同右参将吴浩于抵御中战败而死。边报紧急，形势危殆。明英宗不顾大多数朝臣反对，在太监王振的怂恿和蛊惑下，于七月十五日决定御驾亲征。同日大同守军于阳和后口(今阳高县北)又遭惨败，总督大同军务、西宁侯宋瑛和大同总兵官武进伯朱冕战死，官兵死伤惨重。左参将石亨单骑逃回大同城，镇守太监郭敬藏伏荒草丛中甫得性命。七月十六日明英宗朱祁镇率领 50 万人马从京师出发，由居庸关至宣府，已见军情严重。又冒险进抵大同，先

锋初战不利。王振仍欲再进，郭敬告以敌势，振始恐惧旋师。八月二日命广宁伯刘安为总兵官镇守大同，锦衣卫指挥郭登为都督佥事充参将佐之。八月三日师还，朝臣多言车驾宜取紫荆关方向，庶保无虞。王振乃蔚州人，亦欲借机邀帝幸其家，及师行又恐损其田禾，因之行 40 里复折而东，改道宣府。兵部尚书邝野请疾驰入关，王振不听。十日至宣府，蒙古追兵已蹑迹而至，恭顺侯吴克忠与其弟吴克勤为后卫，力拒之，俱战死；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五万往援亦中其伏，一军俱没。八月十四日英宗至土木堡，蒙古兵大至，土木堡地高，掘井两丈仍不见水，汲道为也先所据，人马饥渴难耐。十五日也先佯退遣使请和，帝诏学士曹鼐复许之。王振见敌退，遽令移营就水，军方移动，也先集劲骑四面冲之，蹂躏而入，明兵争走，行阵溃散，英宗与亲军突围不得出，下马据地而坐，敌掳英宗及中官喜宁而去，其大臣 50 余人被杀，明军死伤数十万人，史称土木堡之变。消息传至北京，明廷一片混乱，有的主张迁都南逃，兵部侍郎于谦等则主坚决抗战，奉郕王摄政。于谦担任兵部尚书后，积极进行抗战准备。首先，诛王振家族及党羽，以平民愤和激励士气。其次，令各族招募民壮，就地操练，候命策应，并调集诸府运粮军、山东及南京备倭军进京担任守卫，令工部齐集物料，昼夜打造攻战器具，并加强各塞城防。此外还查捕瓦剌间谍，编管畿内鞑官。大同方面，也先挟英宗先至宣府，传偷守将杨洪、罗亨信开门出迎，城上对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暮不敢奉诏。”继又西来拥英宗至大同索金帛，总兵广宁伯刘安、侍郎沈固、给事中孙祥、知府霍瑄

等出见，以金二万及前总兵宋瑛等家资奉上，英宗以赐也先。旋参将郭登谋夺驾入城，未果，也先乃拥英宗北去。正统十四年（1449）九月六日，于谦等大臣请太后立郕王为帝，是为景泰帝（明代宗），尊英宗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1450），大赦天下。九月中也先复以英宗名义敲诈宣府及大同，宣府守将杨洪不予理睬，大同总兵刘安则驰至京师，称英宗已进己为侯，奉命来报敌情云，景帝以其擅离守地，下之于狱，另以参将郭登为总兵官镇守大同。十月一日也先又挟英宗至大同，谎称送英宗还京，胁守将开关；郭登闭关不纳。也先遂由阳原进陷白羊口，逼进紫荆关，九日破之，由易县乘虚迂回，进趋京师。兵部尚书于谦将调集至京城的22万人分列京师九门外背城拒战，城厢居民亦人自为战，“外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配合明军。相持五日，瓦剌军连战连败，前阻坚城，后有民兵袭击，沿边各战略要地仍为明军所据守，加以明各地援军渐集，也先恐归路被截，便裹挟英宗从来路仓皇而退。也先原以为明王朝不堪一击，及进兵北京，见城防坚固，军民奋勇为战，方知难以取胜，于是又向明朝要求互市，并遣使议和，送还英宗。而在景泰元年春，大同总兵郭登曾于拷栳山以八百骑击败瓦剌数千骑，对战役全局起了重要作用。此时，蒙古内部矛盾加剧，景泰二年（1451）也先杀其可汗脱脱不花，自立为大元田盛（天圣）可汗，但在内讧中也先兵败被杀，鞑靼部的哈刺嗅噶拓克领主孛来和翁中持鄂拓克领主毛里孩共立脱脱不花之子马古可儿吉思台吉为乌珂克图可汗。可汗年幼，明人称为小王子。孛来与毛里孩不睦，孛来杀小王子，毛里孩攻

杀李来，立马古可儿吉思之子摩伦台吉为可汗。鞑靼部封建主为满足贪婪的欲望，又发动对明地的掠夺，屡犯辽东、宣府、大同、河套等地。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以河套为根据地进犯明边，被称为套寇。而瓦剌部则占据今外蒙全部。“土木之役”的前前后后，更加突出了大同抵御北方边患的重要性，大同的城防也强化了，兴建了北、东、南三关和聚乐、高山二堡。景泰、天顺、成化年间，李来、毛里孩、小王子等皆多次侵扰大同，双方互有胜负。成化二十一年（1485）兵部尚书余子佼奏请明廷修筑大同长城，东起大同中路，西到偏头关，长约600华里，并修筑了井坪堡。

（三）弘治至万历年间的（1488~1619）

当明孝宗弘治年间，东蒙古鞑靼部巴图蒙克取得了政权，称为达延汗（大克可汗），以武力压服蒙古大漠南北各部，迫使瓦剌人迁至今外蒙古的西北部。他为巩固自己的统治，遂将其控制地域分为左右二翼，分封给他的子弟。左翼三万户：察哈尔万户（今锡林郭勒盟），乌梁海（兀良哈）万户（今昭乌达盟），喀尔喀万户（今喀尔喀河流域一带）。右翼三万户：鄂尔多斯万户（今伊克昭盟），土默特万户（今乌兰察布盟），永谢布万户（今张家口以北）。合称六万户府。达延汗本人驻跸于察哈尔万户境，统率左翼三万户，济农（副王）驻营于鄂尔多斯万户境，统率右翼三万户。其后喀尔喀万户人口繁盛，一部分出兴安岭东，称为内喀尔喀，另一部分迁至今外蒙，称为外喀尔喀。达延汗统治初期，由于

集中力量于内部统一,对明朝保持和平关系,但也有些蒙古大封建主如亦不刺、火筛等,不时兴兵犯境掳掠。弘治十三年(1500)四月,鞑靼头领火筛攻雁北。十二月攻大同,南掠百余里。弘治十七年(1504)火筛攻大同,大同指挥使郑禹兵败身亡。正德十二年(1517)达延汗率兵五万骑进到大同境内,抄掠阳和(今阳高),进围应州(今应县),明武宗朱厚照坐镇阳和,指挥明军激战五日,达延汗方才退出塞外。嘉靖二十一年(1542),达延汗死,蒙古重新分裂。其长孙卜赤继承蒙古可汗位,统率左翼,占据察哈尔。巴尔斯博罗特(达延汗第三子)继其兄乌鲁斯博罗特统率右翼,称济农(吉囊),巴尔斯博罗特死后,其长子袞必里克墨尔根继济农位,占据鄂尔多斯万户,次子阿勒坦(俺答)据土默特。蒙古可汗卜赤虽拥有十余万骑,但蒙古封建主多不受其约束,蒙古可汗仅是名义上的共主,甚至有的封建主还自己称汗,与之分庭抗礼。嘉靖十三年(1534)、十四年(1535),济农青把都两次进攻大同,朝野震动。俺答在其兄死后,势力大盛,盘踞河套一带,雄长蒙古诸部,自称可汗(阿勒坦汗)。他曾数次向明廷“奉书求贡”,要求互市。明廷鉴于过去蒙古诸王出尔反尔,拒绝其和市要求。俺答遂大举人犯辽、蓟、宣、大,烧杀抢掠。嘉靖二十一年(1542)五月,俺答人犯大同,深入雁北、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扰掠十卫三十八州县。嘉靖二十二年(1543),俺答复大举寇掠。因贿赂严世蕃而位至大同总兵的仇鸾,重赂俺答,乞求无犯大同。俺答遂率兵进入古北口,明京兵大溃,俺答进至通州,明廷急调大同、宣府、蓟州、辽阳、保定、延绥镇兵入援,俺答已兵临北京城下。

不得已之下，嘉靖帝下令抵抗，而严嵩、仇鸾仍执行“饱将自去，惟坚壁为上”的投降主义路线。这时各地民众群情激愤，到处截击俺答军，俺答无奈饱掠捆载引兵退却，史称这次事件为“庚戌之变”。俺答寇掠明边前后约 20 年；主要是严嵩的投降主义路线助长的。在这种情况下，明廷只好大力加强边防设施。正德年间宣大总督翁万达奏请明廷，“修筑宣大边垣（长城）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嘉靖十八年筑边墙五堡（镇边、镇川、镇虏、镇河、宏赐）。嘉靖二十一年筑大同壕墙 1 道，长 390 华里。嘉靖二十三年筑东路长城 130 里，墩台 154 个，城堡 7 个。嘉靖三十七年整修长城，东起宣府，中经大同，西达右卫，长千余里。明穆宗隆庆年间，边备废弛的情形方始扭转。张居正入阁第二年，上书呈事，备言边防之重要，提出了整饬武备、加强防务的措施。此后调破倭大将谭纶总督蓟辽军务，调王崇古总督宣大军务，调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隆庆五年（1571），俺答孙拔汉那吉归顺明朝，受封为指挥使。俺答虽在战争中掠夺了不少财富，但战争阻碍经济交流，蒙民强烈要求和平和开设互市，发展贸易。俺答遂通过王崇古表达善意，明廷在张居正主持下，答应俺答“永长北方诸部”的要求，封俺答为顺义王，子孙世袭，并于大同得胜堡外举行封赐大典。俺答之妾三娘子世掌兵权，明廷封为忠顺夫人。从此掠夺性战争没有了，明朝边境“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余年”。三娘子学习汉人积极筑板升，建城郭，迅速成为蒙古的手工业和商业中心，明政府赐名归化城，即今呼和浩特市。万历十年（1582）俺答汗死后，其子孙世袭顺义王约二十余年。万历

末即公元 17 世纪初，建州女真（满族）崛起，臣服了鞑靼各部，故明末崇祯年间大同防御的对象是满族了。

三、城市防御

城市防御体系是军旅文化的重要表现，也是建筑文化的集大成者。明清的城市建筑，按城市级别划分为都城、府城、州城、县城等，此外还有商业贸易城市、手工业城市、军事性城市等。大同城既是一座府城，又是一座极其重要的军事城市，所以大同城的规划和布局既反映了明代政治上的高度中央集权，又反映了这座城市军令政令的高度统一，反映了它作为九边重镇之首的宏伟雄壮。

史载，洪武四年七月初一（1371.8.11），明太祖朱元璋遣使命中书右丞相魏国公徐达，自北平往山西操练士马，修缮城池。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开始筑大同城。洪武六年（1373）正月，大将军徐达赴大同督率军民，在辽、金、元旧土城的基础上，“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大同城。该城东西边长 3 里，南北边长 3.5 里，周长 13 里，略呈正方形，面积约 10.5 平方里。城墙一律用规整有制的石条、石方、石板、石础等为基，按照不同的部位选择使用。由于砖制手工业的发展，大同城墙体用三合土夯填后，墙表皆砌以青砖，从此结束了大同城以土为城墙的历史。砖分大、中、小三号，中号的砖约长 40 厘米，宽约 20 厘米，厚 10 厘米，重约 18 公斤，相当于现代普通建筑用砖重量的 7 倍。如此一座城池，用砖量必然大得惊人，可见当年筑城劳动的艰辛。城墙高

约 14 米,最宽处约 16.6 米,其中大墙的正墙高约 12 米,其上的女墙高约 2 米,女墙之上又砌砖垛,高 0.8 米,厚 0.5 米,长约 5 米,垛间距离 0.5 米,称垛口,供军士望和射击。四面城墙共建有垛子 580 对,代表着当时大同县辖境内的村庄数。城墙上有巍峨壮观的门楼 4 座,门楼位于四面城墙的中心,亦称城楼。城门 4 个,东曰和阳,南曰永泰,西曰清远,北曰武定,南城楼即永泰门城楼,重檐九脊歇山顶,面宽 61 米,进深 23.35 米,外有廊柱围绕,其下即拱形门洞和马道。四个门楼形制大体一致,平面均为凸字形,每个面积 1420 平方米,为三层重楼。城墙四角建角楼 4 座,西北角楼称乾楼,高大瑰丽,为城内最高,所以又称镇楼,楼呈八角形,又称八角楼,此楼有“镇楼秋爽”的美誉。54 座望楼伫立在城墙四面,其中乾楼以东的望楼——洪字楼,结构造型精美,为望楼之最。在望楼之间,还建有窝铺 6 座,供守城士卒休憩用。诸多楼阁屹立于城墙之上,昂首比肩,气魄雄壮,在军事上起着瞭望、隐蔽、射击、接应、制高、机动和战时前沿指挥等重要作用。为了更有效地防御,在距城墙 40 米处,掘有壕堑一道,宽 10 米,深 5 米,称护城河,城门前的河上架有吊桥,军情紧急,则扯起吊桥以拒敌。后因运输不便,改筑石桥。四门之外有瓮城,与城墙成凸字形,瓮城之旁辟有偏门,门洞进深约 30 米,瓮城之外又筑一道月弧形城墙,将瓮城圈在其中,谓之月城,月城也辟有城门。这样出入城门必须经过三道门卡,防范之严可想而知。以南北大街为中轴线,城池西半由大同前卫担负防御任务,东半由大同后卫担负防御任务。景泰中巡抚都御史年富筑北小